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André Gide

[法] 纪德 著

L'Immoraliste La Porte étroite

背德者·窄门

李玉民 老高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André Gide

[法] 纪德 著

背德者·窄门

李玉民 老高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德者·窄门/(法)纪德(Gide, A)著;李玉民,老高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5340-6

I. ①背… II. ①纪…②李…③老… III. ①长篇小
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1748号

André Gide
L'Immoraliste
La Porte étroite

背德者·窄门 [法]纪德著 李玉民 老高放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王小阳 安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灏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340-6/I·3088
定价: 2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F·20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味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F·20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

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大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划

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闢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

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

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化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业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

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再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临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超越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

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了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

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惹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是极为张扬的

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年4月

译本序

人性的沉沦与人性的窒息

柳鸣九

《背德者》与《窄门》，往往被人当作纪德文学创作中两部相对称的作品，其原因在于，两部作品各自的主人公在道德问题上体现了不同的对称的倾向，在前一部作品里，主人公为了追求官能的享受而背弃道德，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则为了保持完美纯洁的德行而坚拒尘世的欢乐与人间的幸福。这不仅仅是对称而已，简直就是对立，各走一端，由此，人们又把这两部作品作为纪德思想中尖锐而深刻的矛盾的明证。

纪德的确是一个极为矛盾、极为复杂的作家，他身上的矛盾表现在很多问题上，甚至有时达到了二元对立与分裂的程度。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将有机会在我们这套丛书的范围里提供出另外的例证并专门加以论述。在丛书的这一集中，我们把这两部作品选编在一起，倒不是由于它们在表面上的某种对称或对立，而恰巧是着眼于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同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病态人性的描绘与剖析，它们同样体现了批评的意图与醒世的目的。

《背德者》在纪德的作品中比《窄门》占更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一份形象的资料，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文明危机的一份真实的记录，它还确凿无疑地反映了纪德本人

译本序

人性的沉沦与人性的窒息

柳鸣九

《背德者》与《窄门》，往往被人当作纪德文学创作中两部相对称的作品，其原因在于，两部作品各自的主人公在道德问题上体现了不同的对称的倾向，在前一部作品里，主人公为了追求官能的享受而背弃道德，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则为了保持完美纯洁的德行而坚拒尘世的欢乐与人间的幸福。这不仅仅是对称而已，简直就是对立，各走一端，由此，人们又把这两部作品作为纪德思想中尖锐而深刻的矛盾的明证。

纪德的确是一个极为矛盾、极为复杂的作家，他身上的矛盾表现在很多问题上，甚至有时达到了二元对立与分裂的程度。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将有机会在我们这套丛书的范围里提供出另外的例证并专门加以论述。在丛书的这一集中，我们把这两部作品选编在一起，倒不是由于它们在表面上的某种对称或对立，而恰巧是着眼于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同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病态人性的描绘与剖析，它们同样体现了批评的意图与醒世的目的。

《背德者》在纪德的作品中比《窄门》占更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一份形象的资料，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文明危机的一份真实的记录，它还确凿无疑地反映了纪德本人

思想中的深刻矛盾。

在这里，主人公的沉沦并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堕落，它混杂着复杂的矛盾与哲理的内涵，甚至还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它最初是以正常人性的发现与复归作为其起点的。

小说中的米歇尔，曾经表述了这样一种关于人的认识：世上本来存在着“真正的人”，他保持着自然的形态与原始的力量，而宗教却弃绝他，书籍、教育、文明也力图取消他，竭力要以其积淀在他身上糊上厚厚的文明的涂层，使他丧失了本来的面貌，使他的血肉之躯完全覆盖在如同脂粉一样的涂层之下。这种认识对米歇尔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反思与苏醒，因为，他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断地被涂上一层层文明的“脂粉”。首先，他母亲给了他加尔文派严肃的宗教教育，向他灌输了种种信仰原则的同时，也把古板严肃的作风传给了他，而后，从十五岁起，他被父亲带领走进了故纸堆，在各种古文字、死文字中度过了青年时代，直到二十五岁，“几乎只跟废墟与书籍打交道”。在他这种没有真正的实际生活内容，因而既不懂得生活、也不会生活的灰色生涯中，他也成了一个灰色的没有生趣的人，甚至人正常的机能也在这种厚厚的涂层中快完全萎缩了，他的身体衰弱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于是，自然而然，他婚后很快就大病一场，险些丧命。不过，这倒成为一个转变的契机。为了与死亡斗争，他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他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沐浴阳光，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这样，他又恢复了生机与健康，成为一个强壮的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上述的反思，并下决心要“抖掉身上的涂层”。

事情发展到这里，是完全合理而正常的，米歇尔在仰望蓝天、谛听流水、承受清风、呼吸花香的生活中恢复活力的愉悦，不很像

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一乐章所描写的，过惯枯涩生活的人一投身于田园美景之中，就胸襟舒畅、精神亢奋、意荡神驰、步履轻快的愉悦一般？毫无疑问，读者也随着感到了一种愉悦，正如听田园交响乐第一乐章时的感受一样，而且，小说中米歇尔这一生的转机，还蕴含着由来已久的传统的哲理。

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伟大思想家卢梭，就曾热情地歌颂了人的自然状态与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指出了阶级社会中的文明与人本性的对立。在卢梭看来，原始的人由于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享受着大自然、也经受着大自然的磨练与考验，都有健康的机能、强壮的体质、敏捷的行动、勇敢的精神以及多方面的身体技能，随着人类社会阶级文明的发展与人所受到的各种文明规范的束缚的增加，自然人就随之而蜕化，“人在变为生活于社会的人和奴隶的时候，就成为懦弱的、胆小的、自卑的人，他的温柔软弱的生活方式使其体力与勇气同时衰颓了”（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而安逸则还使得人“更加显著变坏”（同上）。对此，卢梭认为：“我们要是保持自然对于我们所规定的那种简单的、一律的和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几乎可以把那些不幸全都避免了”。于是，回到自然中去就成为卢梭哲学体系中的一条有力的纲领，他著名的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就贯穿了这一主体思想。在这里，他致力于提出一个使文明社会的人尽可能接近自然，返璞归真、医治“文明病”的一整套方案。尽管卢梭对人类文明社会与人类文明正反不分、良莠不辨，因而其批判流于笼统，过于偏激，但他哲理中那种厌弃统治者、安闲者、高贵者束缚人、奴役人的文明规范的愤慨精神却无疑是战斗的、有革命性的，他把纯朴者劳动者与高贵者

闲适者、把“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与“权臣的锦绣衣袍”加以对照与对比的立场，他认为在“粗布衣服”之下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的美学理想，无疑是激进的、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一种高亢的格调，它像一股强劲的风激荡着它以后的时代思潮，不断地引起回响与“变奏”。十八世纪末，那部轰动一时的小说《保尔与维吉妮》，固然就诗意盎然地表现了卢梭这种博大的回到大自然中去、返璞归真的哲理，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司汤达、梅里美这类作家在自己某些著名作品如《意大利遗事》、《卡尔曼》、《高龙巴》里，不也吸收了卢梭学说的营养而派生出对苍白无力的资产阶级个性的厌弃与对粗野不驯的性格、强烈狂暴的行为、原始强悍的力量以及蛮荒的风土人情中一切较少被资产阶级文明沾染的东西的追求？

我暂时不在本文里谈论纪德的《地粮》与十八世纪这一启蒙思想传统的关系，纪德的这部有代表性的名著早于《背德者》四年，于1897年出版，在二十世纪初一个时期内，像一股清新的风吹拂着一代知识分子，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专门谈到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背德者》里米歇尔的复生就体现出了卢梭主义的余绪，他仿效袒胸露臂的农民，赤着身子晒太阳，他投身于清凉的泉水之中，他躺在草地上舒展自己，他夜晚打开窗户睡觉呼吸新鲜空气，所有这些生活方式与情趣，都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卢梭的《爱弥儿》中爱弥儿所接受的“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教育，他觉醒后的反思中所说的那个“古老的人”，即宗教与书籍所要取消的那个“人”，就是卢梭主义中的“自然的人”、“原本的人”，他所说的当代社会中的人身上，既有遮盖了真形的覆盖层，也有覆盖层下“真正的人”，脂粉下的真皮鲜肉，与卢梭所说的“人的现今性质中”有“本原的”与